

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

付开镜

【摘要】 两汉时期,中国北方胡人的性观念还处于非儒家化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民族性观念进入儒家化阶段。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是鲜卑民族汉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魏孝文帝的改革大大提升了鲜卑民族的文化素养和伦理观念,标志着南迁中州鲜卑民族性观念儒家化的基本完成。而到了北齐、北周时期,两朝皇室中出现了严重的乱伦现象,又呈现出“胡化”趋势。这既与他们文化的“胡化”有关,又与他们的特殊身份有关,并未影响鲜卑民族性观念儒家化的总体走向。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儒家化

【中图分类号】 K235;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2)03—0043—07

【作者简介】 付开镜 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530001

所谓性观念,就是性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民族的汉化,就其本质而言,是鲜卑民族文化的汉化。在鲜卑民族文化的汉化过程中,其性观念的儒家化,是鲜卑民族汉化中重要的一环。因此,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是其汉化完成重要的标志之一。

一 两汉史书所载胡人性观念

两汉史书所记胡人落后性观念的主要表现,是性对象以妻后母和报嫂为社会正常行为。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叙述匈奴人习俗说“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①《汉书·匈奴列传》照抄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司马迁对匈奴人性习俗并没有作批评性的评价,只是直书其事,但由此也可知当时的汉人非常了解匈奴的性观念,且轻视其不知礼义。汉朝对匈奴人轻蔑程度极重,汉武帝曾说“匈奴逆天理,乱人伦。”^②虽然汉人对匈奴人婚姻与性关系非常鄙视,但是,在汉帝国与匈奴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和亲中,却要求汉家皇族之女,听随胡人风俗,夫死而改嫁其子。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王昆莫,后又改嫁其孙岑陁。解忧公主也是先嫁岑陁,再嫁陁叔父之子肥王。可见,汉帝国虽然在国家内部独尊儒术,但在对外政治上,和亲的政治目的完全战胜了儒家的性观念,不惜牺牲皇族公主的性伦理,以达到政治之目的。

汉代其他北方或西方少数民族的性观念,与匈奴人大体无别,如《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③《后汉书·乌桓传》载乌桓人:“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④《后汉书·鲜卑传》载鲜卑人:“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

② 《史记》卷111《卫将军列传》,第2923页。

③ 《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69页。

④ 《后汉书》卷90《乌桓传》,第2979页。

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①《魏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②吐谷浑实为鲜卑之分支。因此,其习俗也是鲜卑人的习俗。

儒家文化的本质是伦理文化。伦理文化在家庭中就表现为孝与悌,做到孝的前提是性观念的辈份制度的合理与合情。而儒家的性观念,有多方的规定。儒家并不对性行为进行无端地干涉,《礼记·礼运》明确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强调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礼记·郊特牲》说“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男女有别的含义,就在于不能放纵性行为。如果放纵性行为,也就与禽兽没有区别。春秋时期,秦国远远落后于关东诸国,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仍然是“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③秦国受到关东诸国的鄙视,当与其伦理文化落后,即与男女之分不太清晰大有关系。商鞅在秦进行改革,在家庭生活习俗上推行了儒家化的措施,用法律强制家庭成员分居,从而改变了以往同室而居的陋俗。

两汉政府为了贯彻儒家的性观念,对乱伦的当事人多进行严厉的处罚。西汉的皇族,因乱伦而受到处罚者,不在少数。如汉宗室刘定国“坐禽兽行,自杀。国除为郡。”^④因为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⑤汉朝时期,皇族与官员的婚姻中虽然不计行辈,却绝对不允许妻后母、报寡嫂等行为发生。东汉末,刘备欲纳吴壹之妹,即刘瑁的遗孀,因“疑与瑁同族”犹豫不决,在法正的劝说下,方“纳后为夫人”。^⑥说明当时娶同姓人遗孀,当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指摘。而一妻多夫的现象更不允许。《搜神记》载汉宣帝之世,“燕岱之间有三男共取一妇,生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争,讼廷尉。范延寿断之曰:‘此非人,当以禽兽从母不从父也。请戮三男,以儿还母。’”^⑦一妻多夫搞乱了父系的血缘,而血缘正是儒家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因此,对这种三夫一妻案件,官府严惩不贷。

同样,胡人妻后母,在汉人看来,是严重地混淆了男性家庭血缘及辈份制度,因此也就与动物没有了区别。是故,胡人妻后母的行为,也就因此受到了汉民族上上下下的轻视,被称为“禽兽行”。

汉高祖刘邦曾问计划敬,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刘敬说“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⑧完全把匈奴人当成了异类。征和三年(前90),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匈奴。次年,匈奴遣使出使汉朝,汉朝也派出使者出使匈奴报送其使。期间汉朝使节与匈奴发生了一场争论。史载:

单于使左右难汉使者,曰“汉,礼义国也。贰师道前太子发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私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耳。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⑨

这是面对面的外交论争。汉朝使者一针见血地痛骂了匈奴单于妻后母的禽兽行为。又,《汉书》载终军曾对武帝言及胡人,说胡人有“禽兽行,虎狼心”。^⑩《汉书·匈奴传》评价匈奴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⑪可见,汉朝对胡人甚为轻视,认为他们与禽兽无大区别。与胡人相比,汉民族最为

① 《后汉书》卷90《鲜卑传》,第2985页。

②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40页。

③ 《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4页。

④ 《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58页。

⑤ 《史记》卷51《荆燕世家》,第1997页。

⑥ 《三国志》卷34《穆皇后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6页。

⑦ 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卷11,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4页。

⑧ 《史记》卷99《刘敬传》,第2719页。

⑨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0页。

⑩ 《汉书》卷64下《终军传》,第2815页。

⑪ 《汉书》卷94下《匈奴传》,第3834页。

值得自豪的就是有严格的伦理,尤其是严格的性观念。因此,汉人也就与动物有了严格的界限。而胡人却还没有进化到这一步,因此与禽兽无别。

两晋汉族士人中出现过性乱现象,史载“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①婢妾属于私有,“对弄”当然不触犯法律。不过,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弄”妻子的事件。说明当时的士人虽然以无耻当自由,但是还是没有突破儒家性伦理的基本准则,更不可能无耻到妻后母、报寡嫂的程度。而也有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开放,女性的贞洁观十分淡薄,表现为“男女私通的现象较为常见,而淫乱之事以宫帏为甚”。^②其实,这种性乱,并不为时人所称道,而恰恰为社会主流舆论所诟。再者,这些性乱行为,却极少出现“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的情况。也只是对他人的婢妾有不正当的性行为,而对他人的正妻等少有出格的行为。如果出现女性与他人通奸之事,家中人完全可以杀死通奸者而不受政府处罚。这说明汉人中的士族等,虽然在性行为上十分放荡,但却依然有一个高于胡人性行为的底线,不会父兄死后以后母及嫂为妻。

二 魏晋南北朝以鲜卑人为代表的胡人性观念的儒家化进程

胡人性观念的儒家化进程,比较漫长。从与汉人接触开始,他们就不能不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西汉时期,匈奴人金日磾在长安生活多年后,完全汉化,受到汉朝政府的重用。这一方面表明,汉人对胡人并非完全以禽兽待之;而另一方面也表明,胡人伦理的汉化,需要对汉人文化有深刻的接触,方能见效。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汉化,有两个过程,其一是胡人进入汉文化圈,与汉族人民广泛地接触,从而也就接受了汉人的生活文化;其二是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制度上主动向汉人看齐,从而主动汉化。这两个过程,并非完全是时间上先后的关系,而且还有交叉混合的关系。在这两个过程中,胡人性观念的儒家化,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因此,魏晋南北朝胡人的汉化,必然要与汉文化产生严重冲突。十六国时期,匈奴人与羯人对汉人进行屠杀与奴役,表象是民族矛盾,而本质却是文化矛盾。永嘉五年(311),刘琨把石勒失散的母亲送还石勒,并致信说,如果翻然改图,“今相授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石勒回信直接说“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③石勒信中所表现的民族心理的自尊,源于其民族心理的自卑。为提高羯人的地位,石勒改羯人为国人,不允许汉人言“胡”,用政治的强力推行提高羯人文化的地位,并强制汉人“胡化”。胡汉矛盾冲突的结果,最终酿成了20余万羯人被杀的悲剧。因此,十六国前期胡汉的文化交汇,以双方文化的冲突为主要标志。

但是,在胡汉文化的对抗中,胡人也不得不认同儒家的观念,尤其是性观念。匈奴汉国皇帝刘聪想娶刘殷之女,却担心与己同姓而忐忑不安。《晋书·刘聪载记》记载:

聪后呼延氏死,将纳其太保刘殷女,其弟义固谏。聪更访之于太宰刘延年、太傅刘景。景等皆曰:“臣常闻,太保自云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源既殊,纳之为允。”聪大悦,使其兼大鸿胪李弘拜殷二女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又纳殷女孙四人为贵人,位次贵嫔。谓弘曰:“此女辈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时,且太保于朕实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与圣源实别,陛下正以姓同为恨耳。且魏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乎!为子纳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聪大悦,赐弘黄金六十斤,曰:“卿当以此意谕吾子弟辈!”^④

这说明当时刘聪受到了汉人儒家性观念的深刻影响。不过,毕竟他们同时还保留了本民族的风俗,

① 《晋书》卷27《五行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0页。

② 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妇女的贞洁观与性生活》,《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第220页。

③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第2715页。

④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第2660页。

因此,在决定是否娶刘殷之女时,其本民族固有之习俗战胜了汉民族的儒家伦理。

相对而言,十六国时期鲜卑人的性观念却比匈奴、羯人先进。鲜卑拓跋部在什翼犍统治时期,对于男女随意的性关系已经开始了法律控制。《魏书·刑法志》载建国二年(339)令:“男女不以礼交,皆死。”^①这里的男女不以礼交,可能包括“嫁娶皆先私通”等,^②说明拓跋鲜卑性观念已有了较大进步。这与拓跋鲜卑接触汉族儒家文化有关,如什翼犍本人曾以质子身份在后赵留居10年之久,广泛接触了儒家文化。不过,鲜卑人家庭内部的性乱伦现象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甚至在北魏立国之初,依然存在翁媳婚。

尽管北魏建立之前,鲜卑民族因其早已接触汉民族的文化,从而使其文化与汉族的文化具备了和平交汇并走向汉化的可能,但这并不是说,当鲜卑民族的文化与汉民族的文化交汇之时,就不会发生冲突。事实上,在两种文化交汇的过程中,也一度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种冲突,在北魏统治中原的前期,^③时有表现,尤以太武帝对崔浩等族的血腥屠杀最为突出。《魏书》卷35《崔浩传》: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郗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贼,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④

崔浩被杀,史家论述其因,多从民族矛盾入手,也得其大体。不过,从文化角度来说,乃是因为鲜卑人性观念的进步,提升了其民族强烈自尊心的缘故。因此,崔浩所述“备而不典”,实际上是把鲜卑人祖先婚姻中妻后母、报嫂等为汉人所不耻的性风俗进行了详尽如实地记述。《宋书·索虏传》记:拓跋珪之妾“万人与开(即珪的另一译字)子清河王私通,虑事觉,欲杀开,令万人为内应。夜伺开独处,杀之。”^⑤可能崔浩实书此事,让正在汉化的鲜卑人感受到崔浩旨在“暴扬国恶”,^⑥才导致“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⑦又据周一良先生考证,拓跋珪实为什翼犍之子。崔浩写史可能也揭露了此事。^⑧把拓跋氏先人的丑闻如此暴露无遗,如果面对的是尚未“开化”的鲜卑人,可能算不得什么。但是,崔浩面对的却是已经处于汉化中的鲜卑贵族,他当然要大祸临头了。所以,崔浩被杀,民族冲突是表象,文化冲突却是本质。崔浩即使对汉人,也有过血统种族优劣的观念,他称赞从南朝逃往北魏的王慧龙说“真贵种矣。”^⑨他在北方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也就是为了搞清贵贱的血统。既然汉人的血统有高低之分,而鲜卑人更在汉人之下。因此,崔浩写鲜卑人之史,竟敢“备而不典”,在当时的上层鲜卑人看来,就是故意揭露他们祖先的性乱丑事,意存讥讽。

所以,太武帝对崔浩等人的屠杀,深层的原因,是北魏统治者接受儒家性观念文化过程中,产生了对汉士族人士公开其祖宗乱伦行为的反感。这一时期胡汉文化的冲突,源于鲜卑人接受汉族儒家伦理过程中,对祖先性乱伦行为产生了严重的羞愧感和民族自尊心。因此,在崔浩利用写史的机会公开其祖先的性乱伦丑闻时,不惜对崔浩等汉人士族阶层进行大规模地屠杀,以此来维护其民族的自尊。这正反映了他们接受儒家伦理的程度已经极为深广,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内心隐藏的文化的自卑”。^⑩

① 《魏书》卷111《刑法志》,第2873页。

② 《三国志》卷30《乌丸传》,第834页。

③ 此处依从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的分期标准,拓跋珪建魏至太武帝死为前期。

④ 《魏书》卷35《崔浩传》,第826页。

⑤ 《宋书》卷95《索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22页。

⑥ 《资治通鉴》卷125《宋纪》,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942页。

⑦ 《北史》卷21《崔宏传附子浩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9页。

⑧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书札记》“崔浩国史之狱”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5页。

⑨ 《魏书》卷38《王慧龙传》,第875页。

⑩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化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3页。

太武帝对崔浩的屠杀并不能扭转鲜卑人汉化的趋势。魏孝文帝执政以后,开始全面进行汉化即儒家化的改革,以便快速而完全地与汉民族融合起来。其中与汉人通婚以及在法律上对胡人内部乱伦行为的严惩等政策措施,无不表明以孝文帝为代表的鲜卑人,认识到儒家文化的先进性,因此而挥起改革的巨斧,大力破除落后的性文化观念,以推进其民族性观念的进步,尽快完成性观念的儒家化进程。

三 入主中原的北魏鲜卑族性观念儒家化的基本完成

入主中原的北魏鲜卑族性观念儒家化,在孝文帝统治时期得以基本完成。通过孝文帝的全面的汉化改革,使南迁的多数鲜卑人快速地接受了汉人儒家伦理思想。

在汉化进程中,胡汉通婚是重要的措施。鲜卑人与汉人的通婚,希望通过人种的混合,生育出文化上有汉人儒家思想的后代出来,希望藉此使其民族在文化上迅速地赶上汉人。在这一时期,胡人上层与北方土族进行广泛的通婚,从此也就接受了汉族儒家的性观念标准,并因此得到了汉人对其种族的认同。胡汉通婚,因为有了汉人有文化之女性居其家中,从而也使得胡人后代受到了汉文化的熏陶,因此,跟随北魏孝文帝到达洛阳的鲜卑贵族,通过娶汉族士女为妻室,而使得自己的子女有了汉人的血统,并受到识文断字的汉人母亲的培育,同时也就认同了儒家的风俗习惯,从而,促使他们的后代迅速地由马背民族质变为儒家化的民族,也就迅速填平了与中原汉人文化上的壕沟。

为了维护和推进鲜卑人性观念的儒家化进程的顺利,孝文帝制订了严格的法律制度。太和七年(483),孝文帝下诏禁同姓为婚:“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后仁之政,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①从太和七年的诏书来看,当时鲜卑人同姓为婚的现象还是广泛存在。而同姓为婚,恰是性观念落后的重要表现,又是性乱伦的一个源头,同姓不婚,是汉人最为重要的风俗,也是儒家家庭伦理的重要内容体现。

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北魏政府对于一些发生性乱行为的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打击。《魏书》载御史中尉王显上奏:

“风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恣荡非轨,易室而奸,臊声布于朝野,丑音被于行路,……方恣其淫奸,换妻易妾。荣前在洛州,远迎老寿妻常氏,兵人千里,疲于道路。老寿同敞筭之在梁,若其原疑之无别,男女三人,莫知谁子。人理所未闻,鸟兽之不若。请以见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鸿臚削爵。”诏可。^②

石、抱二人的秽行重点不在于易妾,而在于换妻。虽然不是乱伦,但却造成“莫知谁子”的严重后果,故而受到重惩。查石、抱二人的出身,似非鲜卑,但政府对二人的惩治,并非依据民族而有所区别。由此也可见,北方汉人,受到胡人之影响,其性观念也存在“胡化”的现象。

《颜氏家训》载有北朝人重嫡轻庶的风俗。为何会出现这种风俗?至少可从庶妻的出身得到一点启示。庶妻的来历不太明白,性关系可能杂乱。一来鲜卑人自身性关系杂乱;二来鲜卑人入主中原,鲜卑男人把他们的习俗带入中原,对中原女人可以随意强奸。中原女人所生之子,在这一时期,极有可能非其夫之血脉。因此,北方人尤其是士族重视嫡妻,也就十分正常了。而南朝并不如此,虽然西晋存在对弄侍妾的现象,但毕竟不占社会主流地位。性乱现象远比北方为少。说明南朝男人之妾所生子女,血缘可能纯正,少有性关系杂乱现象。因此可以说明,在性乱的状态下,北方汉族士人十分看重性关系的问题。

^① 《魏书》卷7《孝文帝纪上》,第153页。

^② 《魏书》卷94《阉官传·抱疑传附从弟老寿传》,第2023页。

北魏统治者在汉化过程中,逐渐树立起对南朝性观念的政治宣传优势。表现为,在与南朝的政治攻讦中,不再以夷狄自居,而以华夏正宗自居。在性观念上,北魏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与北齐魏收所撰《魏书》都对东晋南朝皇帝、皇室成员的乱伦行为进行了攻击。《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条载:

永安二年(529)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坐。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①

《魏书·岛夷刘裕传》载:“(刘)骏淫乱无度,蒸其母路氏,秽污之声,布于瓯越。”^②“子业淫其姑,称为谢氏,为贵嫔、夫人,加以殊礼……即义隆第十女,新蔡仅主也。子业矫云主丧,空设丧事,而实纳之。时其姊山阴公主大见爱狎,淫恣过度。”^③《魏书·岛夷萧道成传》:“(萧)昭业与其父宠姬霍氏淫通,纳之后宫。”^④

杨衒之是北魏人,他所记的史实代表着北魏时期汉化的鲜卑人的思想。魏收是北齐史家,但他在《魏书》中所记南朝皇室中的乱伦行径,显然早已传入北朝,也可证明鲜卑人的性观念已超越了南方汉人皇族的伦理规范,并取得了从儒家性伦理上对儒家伦理的褪化的南朝皇帝进行政治攻讦的优势。

四 北齐皇帝性观念的倒退与北周宣帝的乱伦

北魏进入中原的鲜卑人,^⑤在孝文帝去世前后,基本完成了汉化的。但是,北魏迁居中州鲜卑人的汉化,不等于远在代北鲜卑人的汉化。因此,北魏胡汉文化的冲突,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武泰元年(528)契胡尔朱荣带兵入洛,屠杀北魏王公大臣2000余人,汉化的鲜卑贵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本身没有汉化的尔朱荣,入洛屠杀北魏王公大臣,虽然意在夺权,但根子中却是为了迎合未汉化的以鲜卑人为主的六镇军民,建立了东魏,其子高洋通过禅代建立北齐。北齐政权中,胡汉冲突的结果,是政治性的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汉人士族官员如杨愔等在胡汉冲突中受到屠杀。因此,北齐政权是文化严重“胡化”的政权。

“胡化”的高齐皇帝,其性观念必然因其政治权力的高涨而走向“胡化”。清朝乾嘉年间的史学名家赵翼说“古来宫闱之乱,未有如北齐者。”宫闱之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胡化的汉人高欢,“以草窃起事,本不知有伦理。”^⑥因为高欢家族,长期生活于北方边镇,生活习俗均已胡化,而北方边镇胡人的性习俗,本来就处于可妻后母与报嫂的状态,北魏的汉化改革,未能深入到代北边镇。因此,高欢的性行为,一方面受到胡人生活的熏陶,少有儒家性观念;另一方面,作为一方之主,他也就无所顾忌,其性行为也就更趋于动物本能。高洋篡魏后,其兄高澄的妻子元氏居静德宫,高洋曰“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乃淫之。“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乱交之于前。”^⑦武成帝高湛践祚,其乱

①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② 《魏书》卷97《岛夷刘裕传》,第2144页。

③ 《魏书》卷97《岛夷刘裕传》,第2146页。

④ 《魏书》卷98《岛夷萧道成传》,第2167页。

⑤ 万绳楠先生认为迁到中州地区以鲜卑拓拔氏为首的北方各族人民,“统称为鲜卑”,本文采用他的这一观点。见万氏著《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362页。

⑥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5,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21页。

⑦ 《北齐书》卷9《文襄元后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25页。

伦行为更甚于高洋。而北齐宫中的女性也多有性乱者,如武成后胡氏,私下留二男扮作尼姑。北齐亡后,胡氏入北周,恣行奸秽。总之,北齐皇家性关系的混乱,使北齐国家的伦理道德败坏得干干净净。

北齐皇室大肆乱伦,不以为耻,正是代北胡人婚姻生活的延续。北魏入主中原地区的鲜卑人,经过长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早已完成了性观念的儒家化进程。而远在代北六镇的鲜卑人,却未能跟上前者的步伐。因此,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后,依然不改其在代北的性风俗。

与北齐皇族性观念不同的是,北周的宇文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性观念早已儒家化。北魏孝武帝元修,与从妹明月公主存在乱伦关系,入关时把明月公主带到长安,宇文泰令元氏诸王取明月公主杀之。可见,宇文泰的性观念儒家化程度甚深。北周武帝宇文邕是少有的英主,他在位期间,实行复古改革,生活伦理向儒家看齐,因此,北周社会风气,远比北齐与同时代的陈朝为好。但是,天不假其年寿,英年早逝,可堪叹息。继承者周宣帝,竟然“大行在殡,曾无戚容,即阅视先帝宫人,逼为淫乱”。^①周宣帝即位后的乱伦性行为,不能完全证明为种族性观念倒退问题。后来的隋炀帝杨广也有类似的行为,而杨广是汉人并且饱读诗书,心中不可能没有儒家性伦理的存在。可见,这些皇帝的乱伦行为,与其皇权的无限性大有关系。

五 结 论

总之,性观念的进步,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民族性观念进步的原因,在于他们入主中原之后,敢于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而积极地进行了汉化,并因此使其生活伦理儒家化了。性观念儒家化的完成,也就使得鲜卑人从民族心理上得到了自信心的提升,并因此而受到北方汉人士族的支持,同时其民族心理自我调节也达到了质的飞跃,开始以合法的中原皇朝的主人身份统治汉人,并从文化心理上确立了其已质变为汉人的自信。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轻重而种族关系较轻。”^②汉化的北魏鲜卑人政权,在其心理上获得儒家文化的“真传”后,便开始大张旗鼓对南方汉人政权存在的性乱伦这种严重违反儒家性伦理的现象进行“合法的讨伐”,从而实现了民族质的飞跃。而与此同时,在鲜卑人进入中原之后,腾出的广阔土地,成为留在北方大漠的胡人,即随后兴起的突厥等族发展的空间。而突厥等少数民族的性观念,与魏晋南北朝以前居于大漠的匈奴、乌桓、鲜卑等胡人相似,依然存在妻后母与报嫂的性风俗。他们也需要一个性观念的儒家化过程,方能摆脱这种性旧俗。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研讨的内容了。

(责任编辑:张晓东)

^① 《周书》卷7《宣帝纪》,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4页。

^② 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9页。

Abstract

I study on water transportation and military action in middle reaches of Yangzi River in the Wu dynasty which is the first dynasty of the Six Dynasties. In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 the Wu dynasty built up the Baqiu – – Dige Store as strategic strongpoint to help contend jingzhou.

The Xianbei Ethnic's Sexual Attitude Went into Confucian Culture in the Wei – Jin and Southern – Northern Dynasties

FU Kai – jing

In Western – eastern Han Dynasties , living in northern China , the barbarian's sexual attitudes were still in non – Confucian. In Wei – Jin and Southern – Northern Dynasties ,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process that the Xianbei ethnic's sexual attitude went into the Confucian stage.

Shi Bao in the Turn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 also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nalysis Paradigm of Political Group

QIU Lu – ming

The theory about political group is usually seen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research. However , too much reliance on this theory may obscure the complexity of the life process of some political figures. Shi Bao in early Jin dynasty was an example of this. As an important figure who had rendered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early Jin dynasty , his out of favor with Sima clans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Sima Zhao (Emperor Wen of Jin) .

Yi Li Ji Shuo by AO Ji – gong and the Learning of Ritual in Qing Dynasty

GU Qian

As a masterpiece that interpreted the book Yi Li (literally rites) , Yi Li Ji Shuo (literally collected works of rites) by AO Ji – gong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 academic standards. Some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thought highly of Yi Li Ji Shuo while some depreciated it. This paper finds that Yi Li Ji Shuo has its many ideas well proved and therefore could form its own theory. Though the Qing Confucian scholars hated Ao for his book , they could not abolish his theory and had to adopt it from time to time. This is the undeniabl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Ao's theory.

The Change and Social Root for Witchcraft Panic in Jiangnan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U Mao – ming

Witchcraft panic happened many times in Jiangnan (south of the Yangtze) with Taihu Lake regions as its center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witchcraft panic was rooted in Jiangnan people's long existing belief in ghosts or gods , but it was the natural and man – made disaster that led to the panic. Therefore , to some extent , the living space of witchcraft indicated the controlling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grassroots – level society.

Doctor's Income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View on Benefit and Justice of Confucian Medicine – On the Hereditary – doctors Surnamed He in Qingpu

WANG Min

By studying the materials about Hereditary – doctors Surnamed He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institution of income source and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 It also probes further into the in – depth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o reveal the plight of "Excessive Moralization" faced by elite doctors in Qing dynasty.

Zhang Qian and the Translation ,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stitutional History Knowledge in Late Qing Dynasty

ZOU Zhen – huan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had reached basic common sense on carrying